



序 言

陈共存

我从小对历史有特别的兴趣，因此在大学的时期专修历史系；对中国文学虽然有浓厚的兴趣，却非作家。数十年来，写作陈嘉庚的历史和事迹的人，都有各自的立场，所写的只是表面化，未能深入理解陈嘉庚思想的深奥，我也从来未曾有意为他作传。

1950年中国解放后，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代，能够获得正式批准访问中国者我是第一人。当时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国家，为民族，完全没有私心地忘我工作，令我衷心敬佩。由于政治环境的限制，一直到1971年的文革期间，我才第二次访问中国，继后几乎每年都去访问，耳闻目睹了极左思想的疯狂，使我想起中国50年代以来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种种异想天开的运动。文革期间又把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定为工贼、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打倒；接着又是批林批孔批周公。这个可悲的现象，触目惊心。



1980年代中国实施开放政策,有好多文学家和戏剧家,都有浓厚的兴趣要以陈嘉庚为题材创作剧本。他们把剧本的稿件寄来给我者不下数十种,绝大多数都是表面的文章,无从修改。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作者对陈嘉庚在南洋的活动一知半解,对他在国内的处境虽有了解,但也不敢直言表达。50年代从土改开始的种种政治运动,在执行上的偏差,极左的行动,都给陈嘉庚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不是有海外三千万华侨的背景,陈嘉庚的下场可能跟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下场相差无几。陈嘉庚晚年内心的反感和痛心,国内作者既不敢实话实说,更不敢撰写文章。简言之,极左派认为他是资本家,国外却认为他是共产党极左派的同路人。

厦大校友洪永宏教授在未写作陈嘉庚传和剧本之前,曾前往集美学村居住三年,从研究陈氏家世着手,进而研究陈氏一生的历史,然后把创作剧本示我,其内容脱不了文革的八股及极左的笔风。但是他的认真诚恳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经过无数次的深谈,他也多次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实地考察。他所创作的剧本,虽经无数次的研究和修改,仍然未能表达陈嘉庚的真面目。最后在1990年代末期,他才放弃写剧本的计划,转为构思写传记,在改革路线的引导下,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大胆地把陈嘉庚真实思想反映出来。《陈嘉庚新传》终于在今年中完成了。

在先伯父毕生中,和我坐下来详谈只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1937年暑假期间,我随先母来新加坡探亲,才有机会跟先伯父初次会面,听他侃侃而谈,从家世历史谈起,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先伯父对我说:在工商界努力奋斗数十年,吃尽苦头,历尽风霜,由创业而达鼎盛时期,直到最后以收盘告终,人生观也随着改变;现在即使有黄金在地上,我也懒得俯身拾起。

第二次是在1942年1月底日军南侵时,新加坡危在旦夕,即将沦陷,我到怡和轩劝他早日离开。他表示英国政府早期曾向这些协助殖民地政府抗日的人士保证:“如果局势紧急时,政府将安排船只或飞机送你们离开”,可是现在却说船只和飞机都没有,原来英国官员准备当俘虏,那华人的处境就惨了。先伯父也已打定主意,要是不幸被日军抓去,杀剐由他,绝不被利用。

第三次是在抗战胜利后,我由上海回返新加坡时把友人赠送的特大号野山人参转赠给他。他高度赞扬人参对他腰酸背痛的特效。我们虽经过多年的死里逃生,却有机会再次会面,欢喜莫名。

我因为与伯父接触的机会不多,所以对他的认识与了解也是一知半解。

1970年代先母逝世,我在她的遗物中发现先父的六本书信遗稿。这些信都是先父亲笔用日本信笺书写,用复



写纸复印存底。仔细阅读这些遗稿后,开始了解先伯父创办学校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和他百折不挠倾家兴学的精神。先父也秉承先伯父的意愿,衷心合作,鞠躬尽瘁,协助先伯父完成办学的计划和抱负。

阅读先父的遗稿和先母历年片段的口述,把它连贯组织起来,才明白伯父兴办教育,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苦心。再从政治的观点来分析,在违背殖民地政府利益的环境中,他大力发展华文教育,支援祖国抗战和人民解放战争,其困难之大和苦心可想而知。先伯父晚年回到中国,一心一意要为祖国做一些好事,但结果却遭遇到种种奇形怪状的政治运动,精神受到的冲击,真是一言难尽。

先伯父的人生观是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人才,并且以身作则,来作为子侄的楷模。他不遗留产业给后辈,造成一种形势,使自己的子侄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作为社会的寄生虫。我非常感激先伯父,因为他曾经在怡和轩向他的知交说:侄儿共存颇有前途,希望日后能有所作为,继承家族的传统,为社会,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这一句话对我产生很大的鼓励作用。我也要感激先父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使我今天能够问心无愧,如果先父遗留很多家产给我,我今天不晓得变成一个怎样的人,那只有天晓得。

综上所述,先伯父陈嘉庚虽是大家所公认的伟大人物,却也是时代的悲剧人物。今日的中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科学技术



长足进步；载人航天飞船的成功发射而且安全准确在指定目的地着陆，显示出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强盛。先伯父如能亲眼目睹今日中国之富强，定必欣喜万分。可惜在他的晚年所看到的，尽是一些奇形怪状不合常理的政治运动，竟无能反对，以致郁郁而终。正如杜甫咏诸葛亮诗最后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可作为本文的总结，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2003年12月

于新加坡